

政治經濟學社会主义部分 學習參考資料

[九]

(內部資料)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政治經濟學教研室

一九六四年一月

1953年以来苏联农业中私有 經濟大发展的資料

赫魯曉夫曾說，斯大林时期农业落后的主要原因是“违反物质利益原則”。1953年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物质刺激和鼓励发展个人經濟的措施。1953年，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的征购价格和收购价格；降低了国家向集体农戶、工人和职员征购畜产品的定額；降低了个人副业的农业稅額，改按1%公頃宅旁园地固定定額計算（过去集体农戶个人副业的农业稅額按收入計算），而与庄員得自个人副业的总收入无关；豁免集体农庄庄員以往数年的农业税和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和馬鈴薯的积欠。1954年免除集体农戶、工人、职员向国家交售谷物的义务。1956年再次提高馬鈴薯和蔬菜的征购价格和收购价格。1958年完全废除了集体农庄庄員、工人和职员宅旁园地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

由于采取上述措施，大大促使許多农庄庄員破坏农业劳动組合章程，扩大宅旁园地，破坏私养牲畜限額，使私人經濟得到很大的发展并成为公有經濟发展的严重障碍。

现在将收集到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材料輯录如下：

（一）鼓励私人經濟发展的措施和論点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議責成党和苏維埃的机关广泛向集体农民、工人和职员解释苏联部长會議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旨在提高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在发展公有畜牧业方面的物质利益的关于提高畜产品的征购和收购价格的规定……关于苏联部长

會議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实行降低集体农民、工人和职员私人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的定額的决定。

为了使集体农民易于获得个人的牲畜，根据1953年6月15日的統計材料沒有个人牲畜的集体农民，就免除他們1953年下半年的交售肉类的义务并且不叫他們在1954年内交售肉类。

废除集体农民、工人和职员在1953年1月1日以前的过去几年中向国家义务交售私人的畜产品的积欠……。

(苏共中央九月(1953年)全会的決議，《关于进一步發展苏联农业的措施》，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15頁)

从1954年的收获开始起，免除集体农庄庄員、工人、职员、漁業和工艺劳动組合成员等个人經營部分所应向国家繳納的谷物义务交售。

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庄員个人經營部分和其他个体繳納人所应担负的谷物义务交售和支付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的全部积欠額一律豁免。

(《苏共中央六月(1954年)全会关于1954年春播成績、农作物田間管理工作、收获准备工作以及保证完成农产品的征购計劃的决定》。
《苏联进一步發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財政經濟出版社1955年版第271頁)

集体农民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額降低了……此外，集体农民个人副业过去几年在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和馬鈴薯方面的一切欠數

一律取消。

(《苏共中央三月（1954年）全会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的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决议》。《苏联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187页)

从1958年1月1日起，完全废除了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宅旁园地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

(赫鲁晓夫：《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页)

根据1953年8月8日的法令，对从事农业的居民课税，是按照1%公顷土地的固定税率办理，既不管土地内种植什么作物，也不管某一户收入总额有多少（1952年是按每一种农作物来估计庄员及其他居民的收入，同时按照累进税率表根据总收入额规定每户的稅收数额）。

这样的征收农业税的办法，促进了集体农庄庄员私有牲畜头数的增加……

税法规定，降低没有奶牛的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的税额，1953年降低50%，1954年降低30%，其目的在于奖励他们购买奶牛。

(斯·茨普庚：《苏联税务的法律关系和现行税制》，财政经济出版社1957年版第61页)

1953年7月1日以前所实行的农业稅收制度，不能够刺激集体农庄庄员个人副业收入的增长，不能够促进个人經濟中的牲畜、特

別是奶牛头数的增加，不能够引起集体农庄庄員在个人使用的宅旁园地上种植更有价值的农作物的兴趣。

現行的农业稅收制度，是以1953年8月8日苏联最高苏維埃第五次會議通过的稅法为依据的。

共产党和苏維埃政府采取了旨在加强集体农庄庄員个人副业的一系列办法。从1953年起，減低了农业稅的稅額并从根本上改变了稅收制度，降低了集体农户的义务交售定額，提高了頗大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采购价格。全部豁免了集体农庄庄員以往数年的农业稅尾欠，取消了集体农庄庄員以往数年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和馬鈴薯方面的欠額。

（查普良、卡林金等著：《集体农庄和居民的稅捐》，財政經濟出版社1956年版第83—84頁）

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财产的或多或少的增长是从全民财产的发展、从国民财富派生出来的数值，而不是相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的个人所有制同公有制是不矛盾的。

在我們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工人、农民这两个友好的阶级。无论是工人阶级，或者是农民，当它們之中有一部分人經營个人副业的时候，它們絕不会自己同自己顛对立的。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集体农庄經濟成份中存在个人副业反映着农村社会主义关系的不完备，而希望享有一塊宅旁园地，似乎也是集体农庄庄員当中仍旧残存着私有制残余的表現。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实际的。集体农庄是农民的共产主义学校。我們國家已經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設的时期，社会主义关系在农村也完全占居統治地位。必須把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物质刺激，以及他們从物质上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关怀，同私有制残余的表現严格区别开。

苏联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生产資料私有制的某些因素。

(符·溫什尔：《副业是农产品生产的补充源泉》。苏联《經濟問題》1962年第7期)

农民的个人主义的習慣和兴趣已存在了几个世紀之久，在他們参加集体农庄之后不可能一下子就去掉。当然这种情况必然要求在一定时期，在集体农庄范围内保留某些經過改造的个人經濟——新質的集体农庄农戶的个人副业。

个体小农經濟是經常产生和发展資本主义的溫床，而庄員的个人副业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会发展为資本主义經濟。因为，第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沒有生产資料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現象；第二，庄員的副业同集体农庄的公共經濟是結合在一起的，对于公共經濟來說，它处于从属地位。

(叶·布达果娃：《关于集体农庄庄員个人副业的消亡問題》。苏联《經濟科学》1959年第4期)

(二) 庄員、职工和干部普遍热衷于个人經濟

某些集体农庄庄員至今还不能抛弃个人經濟，他們对待个人經濟比公有經濟还要关心。我們区的“游击队”集体农庄，无论哪一戶都有真正的农場，养着猪、奶牛、山羊、綿羊和家禽。甚至連党組織書記丘普罗夫同志的家里也有满满一栏的家禽。可是集体农庄的畜舍却是空空的。

(“沃尔科夫”国营农場生产組組長图金楚夫：
《土地給勤劳人以报偿》。《农村生活报》
1962年9月8日)

我們农庄也有这样的人，他們不把良心帶到公共的田地里，而把它留在自己的宅旁园地上。

根据統計，第五綜合生产队有劳动能力的人165名，但經常出勤的只有80—100人。为什么这些人躲避公共的劳动呢？首先談談馬丽雅，她已經有三年不在农庄工作了。

馬丽雅不去工作是因为她“沒有時間”，因为 她有两份宅旁园地。

我們这里还有許多这样的庄員，他們在收获期間工作15—20天，以后就整年坐在家里，搞自己的菜园。农庄中出現了某种“季节性的工作人員”，他們的生活原則是：什么时候对他们有利，他們就到田地里去。

(“加里宁”集体农庄饲养員馬林尼科娃：《以劳动著名的人》。《真理报》1962年8月27日)

在普列希基和皮亚諾沃（克美罗沃洲）的个人农場是富裕的。他們避过集体农庄，每一家都有8—10头猪，10多只羊和兩头奶牛，有些人甚至有馬。如果少于50只鵝，那就算是穷“农場”。

朴罗梅什連納亚区“共产主义之路”集体农庄对付不了这些个人农場的主人，或者那些在这儿被叫做私有者的人們。私有者踩坏集体农庄的庄稼，乘公家的汽車到市場去。……

各家的猪的头数几乎接近集体农庄猪場的猪的头数。……农庄根本就沒有鵝，但是却有5,000多只貪吃的家禽要用劳动組合的谷物來填滿它們的肚子。沒有什么东西去限制这些貪心的人，国家不征他們的稅。

在村子中心有一所漂亮的新房子。房子的四周是牛圈、小牛房、猪圈、鸡舍。……在这所房子里过去是一个家庭，生产队副队长契

尔尼舍夫一家：他的妻子，妹妹和两个孩子。

忽然，这所房子的中央出現了一堵墙。誰也沒有和誰吵过，然而分家了。为什么要有一堵墙呢？一个家庭可以养一头奶牛，一头小牛；两个家庭就可以养两头奶牛，两头小牛。契尔尼舍不吝惜他的新房子，开了另一个门。他找到了一个窍门去扩大他的农場，同时，一切看来都还是合法的。人人看見10头猪在一个猪圈的一个槽里吃，四头奶牛站在一个牛栏里，副生产队长把农場里的小猪放在同一輛卡車里拉到市場上去。产量不坏：40只小猪！

（伏尔克·达维德琴科：《个人农場》，《消息报》1961年11月24日）

我們集体农庄庄員感到不快的是，有些国营农場工人远远不是处处都能成为表率。国家使他們过渡到7小时工作日，他們收入的钱比集体农庄庄員多，上了年紀的人还有养老金。他們叫做工人，可是现在这种“工人”，冬天在个人經濟中养了乳牛和牛犢、两三只羊、15—20只家禽；他們一年宰两头猪，有30—50%公頃的宅旁园地。这算什么工人呢？当他們全心全意貫注在私有財产之中，就不会为公共的事情操劳費心。国营农場有没有飼料同他們有什么相干呢？只要他們有飼料就行。为了飼养很多牲畜，就需要飼料。从什么地方得到飼料呢？从国营农場。于是不正当的人就不择手段地从国营农場拿走飼料，而公养牲畜却吃不饱。

（“真理”集体农庄主席基尔萨諾夫：《对达维久克同志的信的一些补充》，《农村生活报》1961年1月3日）

娜塔丽雅·别特罗芙娜·卡切尔金娜进了学院，学习五年以后得到了兽医的称号。她被分配到中亚細亚工作。也不知道是对气候

不感兴趣，还是什么原因，过些时候她回到娘家并在卡申定居下来。……卡切尔金娜陷入个人经济中，学院里学到的知识只用于私人的宅旁园地上面。她每天带牛奶到卡申市去卖，回来时背了满满的一网兜面包，用来喂自己的奶牛，小牛和牛犊。

这样过几个礼拜几个月以后，她除了私有的房子，园地，私人的奶牛、小牛和鸡以外，什么也不过问什么也不想。人家不止一次地劝告她，建议她去农业专科学校当教员，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在卡申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地区生产管理局的中心，热衷于靠个人经济过活的人不少。

（耶·卡拉瓦耶夫、沃·图彼茨：《带着毕业证书的懒汉》。《农村生活报》1962年10月16日）

在莫斯科郊外，查莱斯克市的拉格尼村，不久前建筑了一座结实、宽敞并装有玻璃凉台的新房子。

房子旁边有座大型的建筑物——宽敞的猪舍。猪舍也不简单：混凝土的墙、里面有饲料调制室。附近还有温室和温床。

这些不动产的主人是谁呢？就是查莱斯克公路营业段工作人员戈罗德尼切夫和他的妻子、“秋尔基—索科洛沃”国营农场女工人戈罗德尼采娃。他们养了4头猪。

——不都是我们的，——戈罗德尼采娃说，——其中有两头是我妈妈的。

但是住在他们附近的戈罗德尼采娃的妈妈雷仁科娃也养了两头猪。每头重达8—10普特（262—328市斤）他们三人除了有6头大猪以外，还有一大群家禽。

但是，像戈罗德尼切夫和雷仁科娃的人在我市城里不止一个。他们也是在住宅里设“农场”来饲养猪、奶牛、家禽，从商店买面

粉、面包、燕麦米来喂牲口。

例如，查莱斯克育种站工人祖金纳，有奶牛1头，小牛两头，母猪两头，绵羊7只和许多家禽。

这里还有一位新出现的“农场主”——商业工作者波·谢尔巴科夫。他自己一个人生活并且养一头奶牛、10头羊、两只小猪和数只不少的家禽，显然，这不能说明他是由于对动物的爱好。

(查莱斯克市《新生活报》编辑部：《住宅内的“农场”》。《农村生活报》1962年9月15日)

……在我们农庄上地上的诺维科沃村和旧克利齐村有420户人家，而其中只有38个人是庄员，其余都是工业、运输业的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不在任何地方工作）。不只我们农庄如此。很大一部分农村居民是同农庄没有关系的，不参加农庄劳动的。可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有庞大的个人经济，饲养的牲口、家禽比庄员多。每个人都知道：谁要有了庞大的个人经济，15%公顷的宅旁园地就不够。这就是说，这些人是靠农庄的土地，农庄的收成生活的。这使集体经济遭受损失，对劳动纪律起腐蚀作用，引起了庄员的正确的责难。

(“红色矿工”集体农庄主席儒文：《是什么阻碍了事业？》。《农村生活报》1962年11月17日)

在“黎明”集体农庄，损公利己的人占上风，集体农庄理事会无力同他们作斗争，甚至许多过去是忠实的庄员也充满着获取暴利的思想。他们没有时间从事公共经济。不去工作的借口是没有托儿所，农庄根据他们的请求开办了托儿所，可是他们又不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使托儿所不得不关门。农村中增加了许许多多只从事个人经济的私人经营者。邮局副局长阿密里钦柯变成真正的农场主，

在他院子里有奶牛1头、小牛两头、猪两只，还有无数的鸡和鹅。照管这些牲口的是他的妻子和17岁的女儿。他們在集体农庄里不工作，只是“帮帮忙”。

拖拉机手依万有奶牛两头、小牛1头、带仔猪的母猪1只、羊10只，鸡多少无法计算。

这些食客们无代价地割集体农庄牧草地上的干草，用集体农庄的马车去森林中运劈柴。他們任意地把自己的牲口放在集体农庄的草地上吃草，他們还可以自由地到商店买粮食来喂自己的牲口。农村消费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护林员、铁路工段长都靠集体农庄的土地来大力扩充个人经济。

“黎明”农庄共有猪600只、羊780只；而庄员私人所有的猪羊比农庄的要多一倍。

奇怪的是集体农庄党组织书记阿勃拉莫夫别出心裁地解释农业劳动组合的章程。他說，“章程只是在庄员中推行，而工人和职员的经济发展与章程无关。集体农庄不干涉他們的私事”。这种“中立”导致用集体农庄和国家的饲料来喂饱了私人的牲口，而公共的牲畜却缺乏饲料。

（哈尔马诺夫：《食客》，《农村生活报》1962年9月27日）

（三）千方百计侵占公地扩大宅旁园地

在馬依闊布区的莫洛托夫集体农庄内，由于公共土地无人经营，一些与集体农庄庄员称号不相称的人就钻了空子。例如，謝米基娜和拉尼娜二人各侵占了集体农庄0.25公顷菜园地。由于集体农庄管理部对土地监督不严，集体农庄庄员別洛克雷斯和米什娜多占了

0.35公頃菜園地。管理部分給女庄員耶美里揚科的菜園地，超过了規定的數量。

(恩·阿涅西莫夫：《農業勞動組合是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集體農業的唯一正確形式》，蘇聯《社會主義農業》1954年第7期)

沒有監督，組織工作和教育工作薄弱，促使懶漢、二流子增多，有些地方懶漢侵佔集體農莊的土地，建立私人農場，檢查納里曼諾夫—薩阿特林斯克區的農莊時，發現有186個集體農戶破壞宅旁園地的定額，侵佔公地69公頃。與集體農莊沒有任何關係的馬符蘇莫夫占用兩公頃耕地。……甚至他出賣水果和西瓜也沒有人向他收稅。

(薩比拉巴德集體農莊農場生產管理局局長
赫·阿加也夫：《更多的產品，更少的費用》，
《農村生活報》1962年11月11日)

处在大工業中心——日托米爾和科羅斯特舍夫周圍的管理區內的集體農莊中約有一萬名以上的假莊員，他們擅自丟下工作，外出尋找輕松的活兒。

擅自離開農莊的人千方百計地設法為自己保住宅旁園地，並且他們通常都能達到目的，因為在這種場合採取規定的措施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擅自侵佔農莊土地以擴大宅旁地的面積。在我們這個管理區的農莊中有1,080名以上的“擅自侵佔者”，他們非法地使用約達200公頃的公有土地。

(庫里延科：《問題和答復》，《烏克蘭質疑報》
1962年11月18日)

莫斯科州查萊斯克区在放任地方政权的情况下，不劳而食的人任意侵占公地。仅仅在今年就揭发了124起关于侵占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的土地来扩大宅旁园地的事件。貪財者大事扩充个人經濟，作投机买卖来裝滿自己的錢罐。

苏共党员护林員索格拉也夫受到了批評，因为他的0.71公頃宅旁园地中有一半是侵占集体农庄的耕地。他大事扩充个人經濟：有奶牛、小牛、牛犢、母猪各1头，小猪11只，鸡、鵝、火鸡幾几十只，养蜂場一个，大果园一个。他建筑房子占地达117平方公尺。

除了索格拉也夫以外，还有其他人侵占公地……。

(《农村生活报》編輯部的文章：《横棱两可的回答》。《农村生活报》1962年10月2日)

鞋厂工人巴林弄到“布尔什維克”国营农場的土地0.44公頃作为宅旁园地。区消費合作社汽車司机加洛夫金侵占国营农場的土地0.37公頃，建了一所新房子，把旧房子作为私人的养猪場。

林业区巡查員馬洛特科夫在“阿沃捷夫斯克”国营农場有一所房子，一塊地，不久他在城里建了新房子，又得到一塊地。他还在“斯塔雷尼諾”国营农場种了0.2公頃馬鈴薯。农业区的一些工作人員如列敏、布洛达娃、西塔罗夫……都有双份土地。

近几年来，查萊斯克区由于侵占公地課加倍稅的戶数不断增加：1960年为97戶，1961年146戶，1962年增加了一倍。

在查萊斯克区，侵占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的土地成为普遍的現象。

(波利揚切夫：《单干者》。《农村生活报》1962年9月1日)

在赫尔松州“伏龙芝”国营农場有可耕地8,600公頃，居民点占了約3,000公頃，并把793公頃用来作个人的菜园。难道国营农場的500个职工每人有1公頃的宅旁园地是正常的現象嗎？当然不是！这些人家里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和少年都不参加国营农場的生产，而去从事个人經濟。甚至有320戶购买了电动机设备来澆园子。

私人菜园种出来的蔬菜和浆果不仅在赫尔松市場上出卖，而且还到疗养地克里木城去卖。有什么时间从事国营农場的生产呢？

（吉捷斯：《不能容忍这种現象》。《农业报》
1960年2月23日）

我也不能不能不談談这样的非常严肃的問題，如集体园地問題。原来想的挺对：給工厂工人一些园地，讓他們在那里种树和花，让空地成为欣欣向荣的园地，成为集体劳动和休息的場所。

結果如何呢？园子被栅栏隔得一小塊一小塊的；有的还不仅仅限于高高的栅栏，还拴上了狗，为所欲为地造別墅。这里哪有集体园地？

遺憾的是，园艺者当中也有共产党员。如果問他們为什么这样做，回答是：“我的园地，我付出了劳动，我建造了別墅，誰也无权夺走……”。

在原来設想为集体的园地中，許多人根深蒂固地滋长了“我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倾向！

过些时候，园子里长出了剩余的产品，于是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园艺家就把它們拿到市場上去。有人对他们說：你們这样做不好，这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他們却反駁說：“不，这对大家都好，我們增加产品生产”。

富农也說过：我做的是好事情，我供給国家粮食，对雇农行善，

养活他們，給予帮助。这就是实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厂鉗工安东諾夫在莫斯科的莫斯科沃列茨区党代表会議上的發言
《共产党员的党的良心》。《真理报》1961年
9月14日）

（四）把公家的土地分給个人

在前几次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全会上不止一次地談到，在許多集体农庄有分卖公家土地的現象。有些庄員过分扩大自己的宅旁园地，种植各种各样的产物，并以投机价格出卖。这些人在集体农庄中通常是不干活的，靠别人生活。这种情况在庫薩尔、庫班、薩比拉巴德、謝烏欣、阿斯特拉罕——巴札尔和林科拉等生产管理局特別多。党组织和地方苏維埃在同私有制傾向作斗争方面进行得不够有力。农村中这种倾向还表現为，在許多区里，公有牲畜的头数比庄員私人的牲畜头数增长得慢得多。

（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洪多夫于1963年7月4日在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苏联《巴庫工人报》1963年7月5日）

在不久前举行的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尖銳地提到了許多集体农庄有分卖公家土地的情况。

令人遺憾的是，其它共和国也有这类事情。吉尔吉斯的“烏奇·庫爾干”国营农場場长把国家的128公頃地賣給形形色色的坏蛋們。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克里米亚和其他州也发现了分卖土地的事实。

（苏联《农村生活报》1963年8月20日社論）

斯科平生产管理局“紅色处女地”农庄的一批集体农民在寄給編輯部的稿子中写出了他們斯維努什基村所發生的不成体統的事。

多年来，农庄一直是落后的。这里，农作物生产水平很低。去秋，谷物收成每公顷只有6.5公担。一头奶牛产奶量一天不超过3公升。飼料缺乏和照看不好，造成冬天牲口大批病死。

村子里出現了許多懶汉，他們拒絕在集体农庄工作。更坏的是，他們还利用农庄的土地，竭力多弄宅旁园地。

管理委员会有一本簿子。簿子里記了好几行姓名。几乎在每个姓旁边都有“非集体农民”的标记。而稍右边是一个同样的数字：“0.01”。

“用来建筑房屋”，集体农庄副主席馬克西莫夫解释說。“一切都合法……”

真是这样嗎？只要你刚刚停在一个姓比留科夫的宅旁园地附近，你就不会再相信馬克西莫夫話的誠懸性。这是真正的庄园。几十棵苹果树和樱桃树。一串串的醋栗和菸子熟得水盈盈的。蜜蜂在蜂窝旁边嗡嗡地飞。

原来，果园占了0.28公顷。試問，同集体农庄沒有任何关系的比留科夫以什么方式弄到这样大塊的土地呢？

又是一个“0.01”。在卡特科夫的姓旁边。他也不是集体农民。不是工人，不是职员。但是，他有大片的菜园，有新的、质量好的房屋。莫斯科人脾汽車羞答答地藏在汽車房里，不让过路人看見。

又是一个“0.01”。又有……延伸好几米长的篱笆，后面果园发出苹果花的香味。这駁倒了某只不十分誠实的手所写的数字。斯維努什基村有320戶。但是，其中只有20戶是集体农民。

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很随便地从管理委员会領到土地。往往有人为集体农庄干了点小事而分給他园地。而且用来偿付这些劳务的不

仅是土地。譬如，农庄前主席薩維洛夫，慷慨地把公家的干草送给他的熟人，总共搬走了45吨饲料。

在斯維努什基村，对于许多人来说，市场、养蜂场和菜园成了生活的目的和内容。

(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学生扎宾：《集体农庄土地上的农场主》。《苏维埃俄罗斯报》1963年6月12日)

达社区的肥沃土地是无价之宝，必须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它。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

会上揭发有相当一部分可耕地多年以来利用得不合理。许多可耕地变成了种多年生牧草的荒地。此外，土地还往往被胡乱地浪费掉。“米内·赫亚尔马”集体农庄主席萨卢和“内乌科戈德·阿尔迈”集体农庄主席罗特拉斯拉涅有时轻率地把公共土地分给所有想要土地的人。例如，“内乌科戈德·阿尔迈”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把可耕地分给集体农庄放牧。热衷于扩大自己宅旁园地的集体农民在那里播种各种作物，把土地变成私人的园地。在其他一些集体农庄，也通过这种途径“丧失了”30公顷甚至更多的土地。某些国营农场领导人，其中包括“内奥”国营农场场长罗宾和“卢尼亚”国营农场场长沃伊曼也浪费了土地。他们虽然了解维护人民财富的责任，但是却对某些地方过去保留下来的私有制倾向让步。在集体农庄的个人经济中，过多的土地产生极有害的影响，使一些不坚定的人能靠投机发财致富，瓦解劳动纪律，使人们离开公共土地上的工作。

(列伊季：《谈谈土地》，《真理报》1963年5月10日)